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批判的歷史計劃之認識論批判：曼菲德·塔夫利及威尼其學派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Critical Historical Project: Manfredo Tafuri and the School of Venice

doi:10.6154/JBP.1990.5.009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5), 1990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5), 1990

作者/Author：夏鑄九(Chu-Joe Hsia)

頁數/Page：107-122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0/0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90.5.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批判的歷史計劃之認識論批判： 曼菲德·塔夫利及威尼斯學派

夏鑄九\*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Critical Historical Project:

Manfredo Tafuri and the School of Venice

by

Chu-Joe Hsia\*

## 摘 要

本文針對義大利建築史家曼菲德·塔夫利及威尼斯學派所提出之批判的歷史計劃之理論取向提出一個認識論批判。首先，作者將塔夫利及威尼斯學派之形成與轉變放回義大利與戰後歐洲的社會脈絡中做一回顧。然後，就批判歷史之論述本身，將其對空間形式與脈絡組織、應用等三方面的觀點加以闡述。最後，提出一個認識論批判做為總結，由(1)空間的特殊性，(2)論述、空間形式與衝突的社會經濟變動等兩層次，分析塔夫利之歷史計劃之理論性質與限制。

## ABSTRACT

This essay i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approach of the critical history formulated by Italia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Manfredo Tafuri and the school of Venice. First, the evolution of Tafuri's "critical project" and the school of Venice are reviewed in the social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post-war Europe and Italy. Then, the author tries to elaborate upon the substance of Tafuri's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to see how Tafuri deals with these issues: the spatial form, the form-context relationship, and the application. Finally, to conclude this epistemological review, a discussion of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s and the limitation of Tafuri's historical project concentrate on two aspects: 1. The specificity of space; 2. The discourse, spatial form, and conflictive social economic dynamics.

民國79年2月1日收稿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

Manuscript received on February 1, 1990.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在過去十年之中，若依照佛烈德·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轉變，分析義大利版本的後現代主義建築就必需連繫上威尼斯學派的貢獻，特別是其類型學的研究途徑與批判的歷史分析。在觀察義大利的具體情境之時，除了一羣引人注目的建築師（註1）的文獻與作品之外，在他們左近，還有一羣建築批評家與歷史學家，提供了有創見的、較有理論建構能力的歷史詮釋，包括了馬西洛·卡西阿尼（Massimo Cacciari）、喬吉奧·西歐奇（Giorgio Ciucci）、法蘭西斯科·達哥（Francesco Dal Co）、安東尼奧·佛斯卡利（Antonio Foscari）、馬里奧·馬里瑞-伊里亞（Mario Manieri-Elia）、保羅·摩拉奇洛（Paolo Morachiello）、曼菲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喬治·提蘇（Georges Teyssott）等等。在他們之中，曼菲德·塔夫利，一個馬克斯主義的建築史家，是其中最主要、最具領導作用的角色。而且，塔夫利式的“歷史的計劃”（historical project）可以當成是他們在一般理論方向上的代表。

## 一、導言

曼菲德·塔夫利於1935年生於羅馬，1960年於羅馬大學獲得建築學位。他曾在羅馬、米蘭、波勒瑪大學教授建築史，也曾在蘇聯和美國等地講學。自1968年起，塔夫利成為威尼斯大學建築學院（the Istituto Universitario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th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of Venice）（IUAV）的教授，主持建築史研究室（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Architecture）。此外，他也是安德瑞亞·派拉底歐（Andrea Palladio）研究室的國際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塔夫利是一個有生產力的批評家與歷史學者，他研究的範圍極為廣泛，至少涵蓋了下述相關題材：

（一）一般性的現代建築史與近代批評（with Dal Co, 1976/1979），以及特殊性的進步的、前衛的烏托邦歷史（1969c, 1973/1976a）：

威廉·摩里斯（William Morris）思想與建築中的社會主義（1963）；丹下健三的作品（日本的現代建築）（1965/1982b）與勒·柯布西（1984b）；美國的建築與城市歷史（與 Ciucci, Dal Co, Manieri-Elia 合著，1973/1979），如紐約五人團（1976c）、摩天大樓的興亡（1978b）、菲立普·強生（Philip Johnson）與約翰·伯吉（John Burgee）的水晶大教堂（1980）；蘇聯的城鎮規劃史（1973）以及俄羅斯的形式主義；威瑪共和的社會民主與城市（1974）；奧圖·華格（Otto Wanger）

（1981）；維也納社會主義的住宅計劃案（1982e）等。

### （二）義大利建築

由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的建築（例如，布魯涅內斯基（Brunelleschi）（1969a），建築的風範主義（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建築）（1966a），到義大利建築師，像里昂·巴提斯塔·阿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1979c），法蘭西斯科·伯洛米尼（Francesco Borromini）（1965a, 1966b, 1972a, 1979d），喬凡尼·巴提斯塔·普內尼西（Giovanni Battista Piranesi）（1976a, 1977b, 1979d, 1987b），吉瑟普·特蘭尼（Giuseppe Terragni）（1977a），魯多維哥·郭若尼（Ludovico Quaroni）（1964），法朗哥·普瑞尼（Franco Purini）與勞拉特米斯（Laura Thermes）（1980b），維多里奧·葛里高蒂（Vittori Gegotti）（1982a），阿多·羅西（Aldo Rossi）之浮動劇場（1980c），馬里奧·費奧蘭提諾（Mario Fiorentino）在考味爾（Corviale）之 IACP 集合住宅（1981d），以及一完整的，由戰後1944年到1985年之義大利建築史（1986/1989）

### （三）威尼斯歷史

涵蓋政治、科學、城市、建築物等相互編織起來的層次，以及建築師之間的競爭（1969b, 1981/1982, with Foscaoi, 1983; 1984c）。

### （四）建築有關的表現法與其形式（1980d, 1982b）。

（五）理論的論辯與方法論上的擬議（1968/1970/1976/1980, 1976, 1977, 1979/1980, 1986）。

事實上，有件關於塔夫利的理論論述（Tafurian theoretical discourse）的事必須在此一提：塔夫利可說是經由其專業實踐——在每一件陸續發表的主要著作中——來發展其理論架構。（Croset, 1984: 52）。他持續地精煉其歷史方法，界定批評家—史家的角色與任務。這種塔夫利式的論述可以經由威尼斯學派形成的國際脈絡，經由戰後歐洲氣候中的社會與政治土壤而著手了解。回溯塔夫利“歷史的計劃”之精煉過程，其立場與見解的轉變說明了塔夫利知識之旅程：1969年前後的轉移（Llorens, 1984: 85）劃分了六〇年代青年塔夫利的研究途徑與其後期的意識形態分析，以及，其最近對史學方法上的嚴謹要求。

（一）六〇年代整合在卡薩貝拉（Casabella）團體中的青年塔夫利。

由於強悍的左翼勞工之階級運動曾共同面對反法西斯的鬥爭，因此，在第二次大戰甫一結束，主要的歐洲工業國家是以福利國家的新面貌粉墨登場的。一般而言，戰後歐洲的脈絡由社會民主的福利經濟，伴隨著美國支配的馬歇爾重建計劃（1948-53），以及擴張的世界經濟等元素所組成，這是歐洲被美國的經濟所恢復活力的方式。義大利



利半島特殊的情境是，自從 1948 年義大利大選之後，基督教民主黨就成為支配性的國家權力，其合法性之基業未受到挑戰幾達二十年之久。

在義大利的建築論述建構過程中，存在於古典前衛主義、老學院派與官方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對抗、妥協與有爭議性的關係，以理性主義運動（Rationalist Movement）與“米蘭 900”的失敗而告終（Gregotti, 1968: 33, 36; Tafuri and Dal Co, 1979: 294; Portoghesi, 1980/1982: 34-35. Zevi, 1981: 41-43）。這些事情徹底暴露了前衛主義的政治弱點。面對義大利戰後資本主義的脈絡，前衛主義已無法反應社會現實，於是也被要求重新界定其專業角色、任務與設計方法（Llorens, 1981: 84）。在老的學院派之外，在對歷史與現代性方面有兩種不同的新研究途徑。其一為有機建築協會（APAO），以布魯諾·柴非（Bruno Zevi）為代表。（註 2）另一條路線則為郭若尼（MSA 團體）（註 3）以及恩奈斯托·羅格斯（Ernesto N. Rogers）（BBPR 團體）（註 4）所領導。他們都同樣地向歷史尋求支援，然而却訴諸不同的研究途徑。前者將歷史視為一種自然的力量，也未經由對過去的一種細緻纖巧之意識經營設計，以求在形式創新上有所助益，而後者則要求經由對建築形式的精煉來對過去再做檢查（Llorens, 1981: 84）。

我們必需對第二條趨勢進一步追溯。由 1954 年到 1964 年，在羅格斯的指導之下，一個新的世代與卡薩貝拉一同成長了起來，在義大利文化中扮演了一個領袖角色。他們至少包括了貴都·堪尼拉（Guido Canella）、維多里奧·葛雷高蒂，阿多·羅西、吉瑟普·沙莫那、以及曼菲德·塔夫利等等（Gregotti, 1968: 56; Portoghesi, 1980/1982: 40）。由於學院往往是社會資源分派有限的場所，因此卡薩貝拉所鼓吹的方向也就容易涉及教育制度與機構中的權力鬥爭。建築學院的教師在老的學院派領袖與新的世代之間的對抗是嚴酷无情的。在 1948 年以後，除了在威尼斯大學的建築學院中的進步教學嘗試之外，老學院派可以說是完全控制了整個義大利的建築機構。（Gregotti, 1968: 46; Tafuri and Dal Co, 1979: 417）。

在 1936 年，沙莫那到了威尼斯，與義大利其他的建築學校大異其趣，威尼斯變成一個被魯西阿諾·西默蘭尼（Luciano Semerani）稱為“放逐的學校”（1986: 4）布魯諾·柴非、伊格蘭濟奧·卡迪那（Ignazio Gardella）、法朗哥·阿比尼（Franco Albini）、卡洛·史卡帕（Carlo Scarpa）、喬凡尼·阿斯甸哥（Giovanni Astengo）路多維哥·貝吉歐胡索（Lodovico Belgiojoso）、魯西阿諾·西默蘭尼、吉安尼洛·狄卡洛（Giancarlo Carlo）、卡洛·莫安尼洛、以及曼菲德·塔夫利等等，都先後加入了威尼斯建築學院的教授團。

在這個時期中，塔夫利的作品與沙莫那的作品（1971/1986, 1929/1986; Semerani, 1986）、安莫利洛的作品（1986; Semerani, 1986）、葛里高蒂的作品（1968, 1986, Tafuri, 1982）、羅西的作品（1966/1982, 1983）等等高度整合在一起，甚至可以連繫上丘里歐·卡洛·阿岡（Giulio Carlo Argan）（1963）論建築類型的文章。雖然每個人在不同的層次上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他們的作品基本上互相平行。所以塔夫利的作品可以當做是一種在更大的理論模型把他們放到一起，以及是在一個歷史架構中來評估與定位這種趨勢的一種嘗試。我將試著經由其作品、疑旨與哲學基礎來闡述在這段時間中的塔夫利式的理論論述如下：

塔夫利的第一本書是關於魯克維哥·郭若尼（Tafuri, 1964）——這個運動的開拓者，以及羅馬學派（the Roman School）最令人注目的建築師之一（註 5）（Tafuri and Dal Co, 1969: 395; Gregotti 1968: 49）。對這種歷史取向的運動，塔夫利寫道：“驕傲地宣稱自主性的語言為傳統的元素所組成，它與布爾喬亞文化無關，像似歷史的光采般出聲，這歷史不是一個下層階級，也不是一個向上運動階級的歷史，而是一個被壓迫的、卑微階級的歷史；它更類型化、一種民間傳統、在所有健康寫實的考慮之外。”（註 6）

這個歷史的主題，即使在塔夫利第二部作品中仍繼續者——日本的現代建築（1965/1982）。它在三條線索上展開：1. 設計過程與其方法；2. 城市為提供建築意義的脈絡組織；3. 建築語言為象徵溝通的工具。

在他們之間，設計方法似乎成為主要線索（Llorens, 1981: 84）。對塔夫利言，這似乎成為歷史學者的任務了，以致於能連繫歷史的分析與建築教學，貢獻於理論與實踐間的連結。這也就是說，歷史分析需針對設計過程中的原則性操作與方法論層次上的發展潛力全力以赴，做出貢獻。正如湯瑪斯·勞林（Thomas Llorens）精闢的分析，這個歷史傾向貫穿了塔夫利那段年代中的所有作品。由卡薩貝拉上對修正的理性主義的辯論開始（Aymonino et al, 1964），塔夫利的第三本書是關乎風範主義（1966），兩篇關於伯諾米尼的文章（1965, 1966b），一本關乎人文主義的書（1969a），一直到另一本關乎威尼斯建築師傑可伯·沙那維諾（Jacopo Sanaovino）（1969b），這個在設計理論中的歷史研究之類型方法（typological method）像理論論述一般潛藏在塔夫利作品下面。甚至塔夫利在 1969 年之後轉移了他的研究途徑，這個主題仍然在其 1972 年發行的另一本有關伯諾米尼的書上可以找到（Llorens, 1981: 85）。

勞林論塔夫利文章中最精彩處的其中之一為：他指出了類型的疑旨（typological problematic）與唯心論藝術

史的黑格爾假設之間的哲學關連。塔夫利針對“現代運動與過去的方法論之間的決裂，源於對建築師作品所產生的一種非直接控制的新方法引入後所造成的決裂。在意識形態的控制上，在歷史上第一次謹慎地假設一種有美學創造力的內在元素中，而非一無所有”。(Tafuri, 1964: VI)。塔夫利的主要觀點是“控制參數”(Control parameters)，即，在設計過程中的一般規律。在設計的操作過程中，他假設規律建構了“象徵的形式”，它在特定的歷史時代中展現在於這些“象徵形式”與社會整體之間的交流，而是在於設計過程本身中所形成之行動，他對形式的早期觀點仍然關乎恩斯特·卡西爾(Ernest Cassirer)與艾文·潘諾夫斯基的“象徵形式”之“角度”，關乎路奇·伯里昂(Luigi Pareyon)之“構成”(formation)——這是種愛維斯·里哥(Alvis Riegl)的“風格”與康拉德·費德爾(Konrad Fiedler)的“純粹視覺性”之結合。這些觀點的康德主義根源說明了塔夫利還未曾完全拒絕其青年時期之傳統黑格爾式的意識形態。這些唯心主義的觀點也提供他一個經由設計理論的類型方法來連繫歷史分析與設計方法的幻覺。這是卡薩貝拉團體、威尼斯學派、或“設計方法”團體(註7)們，在不同的立場上却共同持有的普同的哲學基礎(Llorens, 1981: 85, 93)。換言之，他們嚐試經由專業實踐來連繫社會、歷史的團體。

#### (二)1969年之後的意識形態批評

在六〇年代的美國以及歐洲，一系列主要的社會運動粉碎了福利國家自由主義與親成長聯盟(progrowth coalition)對整個政治、社會的安排。精確的說，這是政治、社會的危機影響了經濟機制，它最終激起了經濟危機(Castells, 1980)。在六〇年代末，所有社會的、政治的壓力聚集於一點：強悍的勞工運動、針對集體消費的都市社會運動、反文化運動，以及國際關係的轉化。第一，勞資間的鬥爭：一般而言，1968年五月運動之後，社會運動的烽火點燃，廣播各地。特別是，1960與1974之間，義大利勞工對資本案提出了種種實在的要求，造成利潤率急劇下降(例如，1969年義大利工廠中的奧托諾·卡多(Autunno Caldo)事件)。第二，針對集體消費的都市運動：都市運動包括了：住宅運動(例如，義大利的房客聯盟(tenant union)，自由主義的工會SUNA與激進工會UI；為爭取國宅而動員等等)；對抗都市更新的運動，爭取交通運輸之運動(例如，1970年代的威尼斯)，為了公共服務的價格與品質的運動(例如，1973年石油危機中的義大利情況)。第三，反文化運動：婦女運動、違建運動等等。第四，新國際關係：第三世界的崛起、越戰等等。此外，都市社會運動始於1968年革命之後。1968年五月的運動，並不是都市運動，而是個一般性的社會動亂。然而在這之後，運動是以空間領域為基

地，集中於都市之課題。人們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脈絡中動員起來。即使馬克斯主義也一時沒有理論的容量來指導社會運動(Castells, 1983: 299)。這不僅僅是歐洲文化的危機，也是馬克斯主義的危機。在義大利，義共(PCI)試圖處理在1968年之後來自學生與知識分子的批評。所以官方的馬克斯主義與來自左翼知識分子的批評能夠在PCI中共存(Llorens, 1981: 94)。然後，特別是在義大利，在七〇年代，圍繞著工人階級，一個新的社會集團(social bloc)形成了。一個高度豐富多變的義大利都市改革按照不同的社會、政治脈絡被執行了。在這個脈絡組織中，塔夫利在1969年左右轉變了他的理論研究方向。(註8)。

一方面，《建築之理論與歷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Tafuri, 1968/1970/1976/1980)是以塔夫利前階段的、支持建築實踐的歷史方法的努力作為結論的理論架構，例如，類型批評的史學工具主義。另一方面，在此書中，塔夫利指出操作性批評(operation criticism)的理論問題，它不可避免地加諸近代的標準於古代之上(註9)。換言之，操作性批評從事的是意識形態的再生產，而不是創造歷史，提出歷史之診斷(historical diagnosis)。

建築批評必須由對於建築形式的分析改變到對形式外貌形成限制之所有脈絡組織的批評。所以，歷史研究變成“建築意識形態的批評”，以找出建築是什麼，以及建築如何神秘化了形式真正的歷史意義。事實上，將建築視為一種被歷史地限制了以及制度上功能運作的學科，就是一種政治的批評，即使是種間接的政治的批評(Tafuri, 1968/1970/1976/1980: 236; 1978)。

勞林提及塔夫利式的論述之整個發展過程的特性，可以在《建築之理論與歷史》一書再版修訂的過程(1968/1970/1976/1980)中發現。在1970年義大利文第二版說明中，塔夫利拒絕了官方馬克斯主義、馬庫色學派、庸俗社會學、進步的建築師等等。就像沒有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而只有一種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批判那樣，沒有一個階級的建築(一個解放的、社會之建築)，而只有一個對建築之階級批判。這個立場在一篇“P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1969)發展出來，它是塔夫利主要的著作《建築與烏托邦：設計與資本主義之發展》(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1973/1976)的基礎。雖然檢驗現代運動的歷史遺產是塔夫利早期的研究方向(另一個是類型分析)(Tafuri, 1963)，這個主題對現代建築的個案做建築的意識形態分析，以揭秘前衛革命的關係，在十年之後的《建築與烏托邦》中才得以實現。簡言之，建築被視為建構一種烏托邦的意識形態，它為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所支



配。這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建築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關係——假設意識形態的連結被化約為錯誤的意識 (Bois, 1977: 122; Dunster, 1977: 210; Llorens, 1981: 86; McLeod, 1985: 10)。

這個建築的意識形態分析在其兩本與他人合作的著作中獲得完全的發展：《現代建築》(Modern Architecture) (with Dal Co, 1979) 以及《美國的城市：由內戰到新政》(The America City: From the Civil War to New Deal) (with Ciucci Dal Co and Manier-Elia, 1973/1979)，和許多發行廣大的文章中。

最後，一個嚴格歷史方法在七〇年代末終於形成了 (Tafuri, 1977; 1980)。追溯由普內尼西到後現代主義的歷史，建築本身像制度一般被貫穿，成爲一個既定時期意識形態的障礙物，關乎在既定時間中之知覺與心象結構。塔夫利試圖去了解“建築的語言”，然而却不經由一種純粹的語言學的分析去打算重鑄一作品的知識脈絡。歷史被塔夫利視爲一種生產、一種意義的生產，一種解構的工具。在這樣的歷史論述之中，“歷史既是被決定的，又是決定性的：它被自己的傳統，被其分析的對象，被其採納的方法所決定；及決定自己的轉化，一如它所解構的現實。” (Tafuri, 1979/1980: 56)。

此外，他在威尼斯之建築與城市中，在贊助者與專業競爭、政治、科學辯論的張力之間應用其方法 (Tafuri and Foscari, 1983; Tafuri, 1983, 1984)。迄今爲止，在其皇皇巨著的導言之中：《領域與迷宮：由普內尼西到1970年代的前衛與建築》(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 (1980/1987)，塔夫利的史學方法呈現了一種理論重編與理論的嚴謹。所以，以下的分析，大部分的材料都將以這部著作爲基礎。

按照勞林的分析，在塔夫利持續不綴的每一本著作中，其精煉歷史寫作的過程被刻劃爲“順流而去，挾泥帶沙，將其流經區域的養分一一保有”。(Llorens, 1981: 93) 例如，如的前面所提，現代建築歷史遺產的主題在其後繼之工作中才逐步完成。甚至，在歷史寫作的風格上，在其議論之中存在的不是英美的線性邏輯，而是“朝著一遙遠但不是經常能識別的目標射擊”(P. 94)。如同賀龍·巴赫德 (Roland Barthes) 之寫作方法，塔夫利在建築、社會學、哲學與新聞報導中抽取原料，收集在其寶匣之中，以備特定情況而用 (P. 93)。它的敘述是“加諸於其上”(Superimposed) 而非“融合”。事實上，對應著1968年以後馬克斯實踐的多中心理論這些組成元素也是意謂著所謂的“馬克斯主義危機”的哲學與方法論 (Tafuri and Dance, 1981c: 7)。塔夫利式的歷史計劃，不僅僅受惠於阿圖塞所提供的一般基礎，義大利史學家卡

洛·金斯堡 (Carlo Ginzburg) 與安德瑞阿諾·伯里斯培利 (Adriano Prosperi) 的微觀歷史，米謝·福寇 (Micheal Foucault) 的系譜學/考古學，賈可斯·戴希達 (Jacques Derrida) 之解構，而且奠基於亨利·羅伯·齊默 (Heinrich Robert Zimmer)、華德·班哲明 (Walter Benjamin)、佛洛伊德、尼采甚至海德格 (註10) 的早期傳統之上，不容易限定塔夫利式方法論混合的邊界：馬克斯主義、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以及尼采與佛洛伊德之思想。這就是所謂在後葛蘭西的義大利土壤上之“後馬克斯主義”的塔夫利立場。

二十年前的義大利，現代建築與近代城市的歷史研究完全仰賴於二手與三手的資料與文件。現在，這種難以忍受的情境已經改變了，全世界沒有任何地方的建築史學研究成果在理論創新的建樹上能超過義大利 (Hancock, 1980: 469)。曼菲德·塔夫利與其同僚的貢獻是造就了這個成果的主要力量。威尼斯學派在對於陳腐的、保守的，在社會運動所推動的反省風潮下動搖的主流建築史論述而言，提供了一條不同的選擇。尤其是有理想的第三世界留學生言，若有志於建築歷史與理論，今天的威尼斯大學建築學院已成爲他們心目中新的取經地了。

## 二、空間形式

由於在1969年的政變，卡薩貝拉團體將類型當作分析工具的研究方法被塔夫利放棄了。不論是郭翠米爾·狄昆西 (Quatremere de Quincy) 對原型 (archetype) 的觀念，還是尚·尼可拉斯·路易·杜蘭 (Jean-Nicholas-Loris Durand) 的建築物類型 (building type) 的觀點，在1969年之後都不再煩惱塔夫利了。事實上，在羅西、安莫尼洛、羅伯·柯爾 (Rob Krier) 與阿岡的類型觀點中，在靜態的、固定的結構與社會的、歷史的變動之間的矛盾在在顯示了他們的新柏拉圖主義之形式主義“永恒不變” (constant) 與“先驗” (a priori)，而非論述中的辯証地建構 (Mead, 1983; McLeod, 1984; Dickens, 1981)。這是在六〇年代末與七〇年代歐洲進步的知識份子共同的形式主義的特色之一。他們堅持上層建築的相對自主性，拒絕了史大林主義與其他的經濟主義、歷史主義、經驗主義、現象學與人道主義。他們陷入了阿圖塞主義的陷阱之中，即，新康德主義的認識論之中 (註11)。

對塔夫利而言，對營造物 (building artifacts) 的分析關乎所有的脈絡組織，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分析。在我們了解他如何組織他的概念來處理空間形式與脈絡組織的關係之前，在本節我先看看塔夫利如何在其著作中研究空間形式本身。

### (一)主體與客體的關係。

對塔夫利式的論述而言，建築本身被當做為一種制度，“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障礙物”（Tafuri, 1979/1980: 59）。在塔夫利式的意識形態分析上有一個精煉的過程：

在建築的理論與歷史一書中，塔夫利式批評的範域要求由建築對象（客體）的分析改變到對限制對象（客體）形狀的所有脈絡進行全面的分析。他注意到建築師之意識形態計劃書的脈絡分析，而非對他們的作品做計劃書方式的分析。這也就是為何葉夫·阿蘭·波伊斯（Yve-Alain Bois）認為塔夫利式的史學失去了建築對象（客體）本身，在意識形態詮釋的剩餘之下，正文就看不到了。波伊斯認為一個將建築視做後設語言的深思熟慮的實踐才是適當的（Bois, 1977: 118, 120）。

然後，在《領域與迷宮》一書中，一個更細緻的分析被塔夫利發展出來了。意識形態並不以一種線性的過程運作，僅將調查由正文轉移到脈絡是不夠的。他寫道：“脈絡組織擠壓藝術的語言、實質現實、行為、都市與領域的向度、政治經濟變動在一起，但是它被“技巧上的插曲”繼續不斷地改變：被戰術上的巧計——它和大的戰略含糊不明地相交織；被隱藏的意識形態——它在主體之間的層次上操作；以及不同的支配技巧的反應，等等繼續不斷地改變，這每一個都具有特殊的、但却是不能翻譯的語言”（Tafuri, 1979/80: 59-60）。

對塔夫利而言，史家／批評家必需由關乎作品結構之內的參數對意圖之限制條件來度量作品。塔夫利式的特殊的語言分析試圖避免庸俗馬克斯主義的途徑。建築的對象為一種閱讀所強調，這閱讀處於可檢驗的參數基礎之上，處於在生產關係變動之內部的真實決策之上（Tafuri, 1979/80: 69）。用詹明信的話來說，最好是去審視在意圖與實踐已經獲致的效果之間的關係，而非以一教條態度將形式化約為先驗（Jameson 1985: 60）。

更進一步，既然建築本身被界定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障礙物，在其論述的形式之中，主客體的關係（以及形式與價值的關係）就可經由意識形態之空間的課題來了解。至少，在這點上，對建築作品的巴赫德式的閱讀，似乎比海德格式的閱讀更為塔夫利所接受。在詹明信論塔夫利文章的一開頭，意識形態空間的課題就已經清楚地闡明了。詹明信由以下的角度提出議論：自然主義式的，或人類學式的角度，特別是在現象學中，傾向於經由感覺的身體來度量異化了的空間。然而，“以一人體做為論爭的基礎，基本上是非歷史的，這涉及一些關乎永恒的‘人性’的前題……在現實中，身體是一社會性的身體，這兒沒有預先設定了的人體，而是身體之社會經驗的整個歷史之範圍。這就是說，身體的不同規範為不同的歷史的‘生產方式’或社會構造所投射。所以，現象學之論述中的空間中的身體所

要求‘回到’更‘自然’的觀點，在其不是一鄉愁時似乎也是意識形態的”（Jameson, 1985: 51）。這正是塔夫利式的意識形態分析所想要處理的。

作為結論，處理主客體關係，塔夫利似乎是拒絕了結構主義與詮釋學。他處理豐富與複雜的主體，但是超越了現象學的曖昧，即，對接收過程提供了一個批判性分析。他也針對形式與正文提出嚴格的分析，但是却反對巴赫德式純粹正文性的“語言的神奇範圍”（Ockman, 1985: 183, 184; Jameson, 1985: 62, 65）。換言之，針對建築語構與文法的理論所造成的問題也被塔夫利有意地避免了（Tafuri, 1968/1970/1976/1980: 227）。

### (二)價值與形式的關係

順著前面討論的邏輯，形式的意象，對塔夫利言，不是一種修辭學上的形象。所以，價值與形式的關係應被安頓在社會歷史的脈絡中來追溯價值的功能，來揭露歷史的面具。

既然建築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障礙物，對既定歷史時期之心象結構的意識形態分析就是了解建築所必需的事。對塔夫利言，也必然會拒絕“操作性批評”的研究方法，因為它像虛幻的歷史分析般投射了對一個新風格的規範性價值（Jameson, 1985: 65）。例如，羅伯·范求利（Robert Venturi）的批評之中，對模糊、曖昧與矛盾的價值（Tafuri, 1968/1970/1972/1980: 213），或者，保衛現代主義的史家的道德性，像基提恩與派夫斯勒（Ingersoll, 1986: 14）。

塔夫利寫道：“嚴厲斥責‘操作性批評’之方法是沒有用的——更正確的是先用‘規範性的’標籤區分他們，避免把我們真正的意圖弄模糊了——讓其基本原則不受影響”。然而，意識形態絕不會像機械的力量般作用著。“意識形態絕不會像一種‘純粹’力量般作用。它不僅是‘土壤’，和被實踐所‘孕育’，而且它與其他的，經常是正好互相對立的意識形態，相互糾纏”（Tafuri, 1979/1980: 65）。涉及弗洛伊德之觀察，塔夫利認識到找出隱藏性質的必要性：“在正文的變形扭曲之中，有一類似謀殺的東西。困難不在於惡行，而在於除去了蹤跡”（Tafuri, 1979/1980: 62）。我們看到塔夫利避開了形式主義的陷阱，看到空間正文變形之中的意識形態潛藏著的自然化過程。

所以，意識形態的批評就是尋求歷史分析的能力來移開附著在作品觀念上的人為的神話（Tafuri, 1979/1980: 71）。他採納了班哲明的貢獻，古典形式的“氣息與風味”（aura），以及獨特性的風味，都為藝術的機械再生產所永遠地摧毀了。此處，瑟德·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話是對的：“這些作品的‘說明的價值’應及時取代其風格所感應的‘崇拜價值’，這是一交換過程成熟的階段”（P. 72）。語言的豐滿性，形式的絕對連貫性已經



歷史地被摧毀了。去尋求一鄉愁的“中心性”的永遠的結構，是去蒙蔽歷史的現實。“當前，除了追溯歷史之外，真正是沒有其他的可能性了，而這樣做却導致了符徵與符旨之間的分離，導致再一次行經不穩定之結合的危機之旅程，以及導致具體化其本質的結構……”（P. 61）。所以，追溯價值在脈絡中的作用，揭露歷史的面具就成為塔夫利式批判史家的任務了。

### 三、形式與脈絡組織的關係

我已經提過在塔夫利式的歷史計劃被中逐漸出現一種較複雜的理論架構來處理形式與脈絡組織的關係：將調查僅僅由正文轉移到脈絡組織去，成為脈絡批評（contextual criticism）是不夠的。一切“技術插曲”經常在正文與脈絡組織之間中介，就像戰術上的折衝、隱藏的意識形態，對不同支配技術的反應……等等。他們每一個都有一種特殊的，但不能傳譯的語言。以下，我試圖檢視在塔夫利式的理論論述中如何處理在文化脈絡與正文、社會脈絡與正文之間的非直接關係。

#### （一）形式與文化脈絡

對塔夫利言，在正文與脈絡間的非直接傳遞關係之不能傳譯語言，是基於認識到“對形式其邊界的本質這個主題、語言的限制這個主題，是歷史地決定了的危機的整合部分……”（Tafuri, 1979/1980: 60）。他由西默爾處（Georg Simmel）處引用尼采式的對形式與邊界的看法：“形式的秘密在於它是一邊界；它是事物本身，以處存在與事物的不存在僅是一件事。”然後，塔夫利試圖反應記號學的失敗，原型象徵的無知，形式分析的絕對連貫性，即，康德主義超驗的統一性。事實上，它正是當前社會本質結構的具體化，然後像我們前面所提的，意識形態“藏身於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的外表，表意實踐狡詐地藏匿在為了轉化現實的技巧褶縫之中……”。換言之，它是濃縮為一個名字、一個符號、一種語言、一種意識形態的偶像”（P. 61）。進一步，經由套用馬克斯對拜物教秘密的觀點，我可以加幾個字以擴充塔夫利的觀點：語言、正文、或形式是一種平凡的感覺物件。但是現在，它變為一個超感覺的物件。它不僅是用腳踩在地上，而且還是用頭倒立著。形式將我們自己勞動的社會特性反映為勞動產品本身的特性，反映為這些物的社會的天然屬性。經由這轉換，形式變成是感覺的物件，它同時又是超感覺的或社會的物件。它不過是人們自己之間一定的社會關係，但它在人們面限採取了物與物關係的虛幻形式。

一再，塔夫利回到尼采，語言之使用變成一支支配的技巧。最後，“歷史系譜學體現為勞動，一種解構與重建的勞動所有的特性”，它解除了意識形態與符號拜物教的秘

密。此外，在語言、價值與科學構造中，尼采式的發現“大量遺漏”，以及弗洛伊德式“釋明”（deciphering）的工作，兩者都在塔夫利的論述中連繫為一基本的分析（Tafuri, 1979/1980: 62）。歷史分析的解秘，暴露了符徵（signifier）與符旨（signified）的分離性，說明了它呈現的正是正文中的虛空，一意識形態幻覺的空白，檢視了被“正文”地位之“完成的品質”所掩蓋起來的問題（P. 67）。

#### （二）形式與社會脈絡

順著形式邊界與語言的限制本質的邏輯，塔夫利提到“多重邊界”的問題。生活的現象呈現了生存的每一時刻中力量的多數性。這也就是說，喬治·西默爾的話可以進一步認識為：“社會生活似乎成為寸土必爭的戰場，以及社會制度似乎像那些連續作用的主要對手間短暫之調停後所假設的一外顯的合作形式”（Tafuri, 1979/1980: 60）。

在同樣的脈絡下，塔夫利“談到多種的辯証”來分析建築的神話，處理社會脈絡與正文間的關係。對他言，歷史的對象是分析權力/制度的對抗。“實質空間的營造肯定是‘爭戰’之場地：正確的都市分析充分地表明了這點。這種爭鬥不是極權主義的，它留下邊緣、餘數、剩餘，也是無可置疑的事實。”（Tafuri, 1979/1980: 62）。這是歷史調查的廣大領域。此處，塔夫利式之批判歷史很明顯地接受了後結構主義與尼采的理論。

最後，由於主體的複雜性（Tafuri, 1979/1980: 56）以及脈絡的多數性，史家對特殊歷史事實的意義生產，意謂著多重的、脈絡化的詮釋性知識，理論語言的多元性意謂著主體、科學、制度、與語言的多數性是組織現實的唯一方式。然而，歷史不能化約為一種詮釋學，而需接受福寇與尼采的系譜學（genealogy）。不僅是辨明制度的障礙，我們必需認明我們處身在權力系統之內。現在，有別於其早期觀點，尼采與福寇的基本主旨已經清楚地表明了：“權力本身是多數的；它超越社會階級、意識形態與制度”（P. 159）。

### 四、應用的層次

對塔夫利言，只有歷史，而並沒有批評。事實上，在“批評”中所造成的混淆是由於附屬於專業的雜誌，是由於盎格魯—薩克遜的思想習慣傳統造成的混淆（註12）。塔夫利繼承的不是英美文學與藝術領域中的批評，而是歐陸哲學領域中的批判，是發現事物之性質限制的一種思考活動的特殊形式。在最近一次的訪問中，塔夫利說：“建築師幹建築，而史學家應寫歷史……歷史研究有影響行動的間接方式”（Tafuri, 1986, 11）。建築師與建築批評在建築實踐中應如此劃分清楚嗎？我們最後會再提到這一點。



在塔夫利式的論述中，建築是視為單一的意識形態障礙，即，為支配階級利益的表現。建築生產除了在其最小的角色，像好的手藝人對實質元素完美的要求之外，建築事實上，特別是前衛者，像維繫資本主義的角色般地作用著。所以，下面的論點將強調在應用層次上的兩條主線：(一)建築師與政治投身間的衝突，(二)批判的歷史。

### (一)建築與政治投身間的衝突

按照塔夫利的議論，即使“批判的”建築亦不過是支配權力的一種制度的工具。

“連結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被識作類比的知識不再有效了”(Tafuri, 1986: 11)。至於建築，已不再有做為知識整體的基礎，或連繫的角色了。建築不再像十六世紀時歐洲那樣，是知識與科學的宇宙觀的綜合。同時，建築的風味也失去了，建築為營造的再生產所取代。它不再是“宇宙”的隱喻，而是“多重世界”的反映。建築扮演的角色，“在十八、十九世紀中所扮演的，是策略的主角，是了解權力對生存世界控制，對行為控制，對社會階級控制的主角”(Tafuri, 1981: 8)。如今，建築美學的形式已失去了它慰藉恒常人性的焦慮與不安全感的力量。對塔夫利言，不再有革命的建築。“投身的建築，試圖政治地與社會地吸引我們的建築，已經結束了，剩下來所追求的只是一個空洞的建築……”(Tafuri, 1986: 11)，即，前衛取向的過程。批判的建築師僅有的選擇是，在傳統專業邊界之外去找到革命實踐的方向。(McLeod, 1985: 11)。

塔夫利肯定看到了建築師與政治投身間的衝突，在建築師所生產的與他所思考的與所寫的(即，論述)之間的矛盾。在政治的進步傾向與作品的效果之間有一種矛盾存在。進一步，這意謂著要在下一節中所談的兩個課題。

第一，它說明了在作品的空間語言、寫作的口語語言、以及社會現實之間不能傳譯的問題。第二，度量一個案子需要多進步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一個建築師政治上的進步並不必然是產生好作品的必要條件。它有賴於社會歷史的脈絡。然而，對建築言，套用泰雷·伊格頓(Terry Eagleton)的話來說，下述之情境却是真的：假如建築與時代中有意義的運動絕緣，與歷史之中心脫離，它就必然會淪為瑣細無足輕重的地位(Eagleton, 1976: 57)，這就是塔夫利所要表明的。然後，一個對“建築”極端寬廣的意義、一個建築技術人員的角色、以及一個批評家/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歷史所必需的了。

在理論建構的層次上，我們在關於政治投身與建築之間的矛盾應還可做更進一步的釐清。目前，建築與時代中有意義的運動絕緣，與社會變遷逐漸失去了密切連繫。要突破建築的困境之關鍵並不在於建築師個人的選擇，而是在於建築論述如何能不昧於現實，如何能認識到吾人創造歷史的特殊過程(the specific process of making

history)。因此，在認識論層次上，規範性理論與分析性理論又如何能分離存在呢？實踐與認識又如何能分離呢？

順著批評家/史學家與建築師之間分離的議論，塔夫利式史家的任務就是要去解除專業實踐的意識形態性質之神秘。

### (二)批判的歷史

不僅僅建築失去了空間形式的力量——它具有絕對的連貫性與中心的象徵力量，而且敘事歷史與寫實主義小說也一樣，以詹明信的話來說，自十九世紀末就有了危機(Jameson, 1985: 56)。對塔夫利言，這就是批判史家的角色與時勢。因此，塔夫利式史學分析的有效性最能有所發揮之處也正在於現代與近代時期——由封建主義的危機到今天。塔夫利式的論述正是屬於這個多重與變動意義的不確實脈絡組織——這是營造生產之中的轉化之結果，不能被化約為任何單一可分享的準則(Tafuri, 1979/1980: 71)。現在，我們將義大利的歷史當做塔夫利之論述形式的摘要說明於下，它也可視為我們所說的塔夫利式歷史“迷宮”的結論(註13)。

第一，對後馬克斯主義的批判歷史而言，沒有單一的方法論。對塔夫利而言，批判的歷史不應將自己封閉在一凍結僵硬的學派的單一方法論中。對不同的學域都有話要說。他拒絕方法論上關乎折衷主義的控訴，因為建築學域其片斷化了的與多重刻面的特性，因為這是對建築提出極端廣闊意義後的特性(Tafuri, 1979/1980: 68, 71)。批判的歷史是一個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鬥爭。塔夫利關心的是戰鬥的策略。對他言，歷史是“在線索之上完成的建構，當戰爭已經結束，在戰場上遺留下來的一系列軌跡之上所建構情境的過程。”在這意義下，歷史的重建也是相同的。“在這意義下，歷史是按照表現它們自己的各種機會，使用不同方法的策略”(Tafuri, 1980: 9)。

第二，批判的歷史並非針對客體。所以客體的選擇，並非塔夫利論述的問題，而是代之以“問題”。客體只有在脈絡之中才有意義，在它們與問題的發生的關係之方法才顯示出意義。塔夫利宣稱：“為了處理作品背後的問題，史家必需放棄他對作品品質的偏見。”(Tafuri, 1986a: 10)。這意謂著建築論述的意識形態分析。

第三，批判史家創造一種距離來解除表現意識形態的自然化之修辭(措辭)(rhetoric)。替代簡單地將調查轉移到脈絡，批判的史家處理建築之意識形態自然化(naturalization)，即，一個自然化了的修(措)辭(a naturalized rhetoric)。批判的歷史是一個解密的計劃(a project of demythification)，它致力於審視社會地建構起來的建築語言中的自然化過程(Prophyrios, 1985: 19)。然後，創造一種對作品的距離，表現作品的一種人

為距離，對歷史言是基本的。這可以經由與其他時代的比較而獲致。對其他時代的深刻知識，使我們對現在有一更好的了解（Tafuri, 1986a: 10; 1979/1980: 70）。簡言之，塔夫利的研究的中心主旨就是意識形態的歷史角色（1979/1980: 69）。

第四，批判的歷史對循環（cycles）有興趣。對塔夫利的論述言，批判史家對說明循環更感興趣——一系列事物——而非建築師個人作品風格的分類法（Tafuri, 1986a: 11）。必需去檢查重建歷史時期的準則，在有最完滿意義之詞語中建構結構性的循環（structural cycles）（Tafuri, 1979/1980: 69）。

最後，對於批判史家言，歷史僅僅是在現實戰鬥中的許多聲音的一種，這聲音不能也不會自己就獨立宣告戰鬥的勝利。它參與在衆多力量的整體計劃之中，在知識的勞動上扮演它自己的角色（Tafuri, 1981c: 7）。塔夫利說：做為史家，我們的任務是經由現代歷史重建知識勞動清明透徹的過程，在如此行事下，歷史工作者重新確認這個有條件的任務，這要求勞動力的新的組織”（Tafuri, 1979/1980: 73）。

## 五、認識論的批判

在檢視塔夫利的歷史計劃的過程中，有兩個潛藏著的問題：“什麼是營造的造物（building artifacts）？”以及“什麼是空間與經濟、政治實踐間的關係？”他們關乎塔夫利論述的預設，以及其中心的價值。論述的形式（discursive form）決定了塔夫利的政治“悲觀主義”（Jameson, 1985: 65）。

基於尼采與福寇的系譜學與考古學，塔夫利之歷史論述與目前在建築史中的任何範型都不相符合。對他而言，歷史非關乎客體、風格或是正文與形式，而是關心對學域間脈絡（interdisciplinary context）的問題。在形式的分析中，塔夫利注意潛在的意義而非正文的直接溝通。

順著班哲明的研究方法，對建築永久風味的毀壞，塔夫利對符號的分析是中肯的——符旨隨著符徵所涉及的不同脈絡而改變。這是像福寇、戴希達這樣的後結構主義的觀點——語言遠比結構主義所認為的要不穩定（Eagleton, 1983: 129）。如我們所知，塔夫利拒絕了康德主義的先驗的正文，因為他接受了將建築視為一種制度的說法而非一種本體論的說法。他拒絕了結構主義與記號學對形式的非歷史分析。塔夫利也拒絕了一種預設的人類主體，一種詮釋學的歷史的身體。此外，他的政治立場與心中的價值也拒絕了操作性批評與語意分析也是可了解的：這就是說，他尋求一種“歷史的系譜學”（historical genealogy）而非一種正文的科學（textual science）。

然而，第一，為了完全地反應來自波伊斯——一個賀龍·巴赫德的學生的批評，即“客體（對象）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object），我們可以說，僅有對專業的意識形態計劃書的意識形態分析（非對營造人造物之計劃書式的閱讀）仍是不夠的（Bois, 1977; 1981: 60）。進一步，代之以簡單地由正文轉移到脈絡，對塔夫利言，脈絡擠壓社會、政治與實質的元素在一起，以及為特殊的，與不能傳譯的政治、經濟、專業、與意識形態的技巧所中介與斡旋。第二、即使他連續地精煉其歷史方法，迄今，有幾個針對“專業的意識形態計劃書”（以波伊斯的話來說）的問題，在歷史脈絡、社會內容與空間形式之間，還不能提供有說服力的答案。這就是說，塔夫利還未能提供一個清楚的、社會、歷史的理論架構。以下就兩項問題做進一步的闡述：

### （一）空間的特殊性

塔夫利對美國的精英建築師間的“灰”與“白”派之爭的批判是銳利的。塔夫利說：這僅是一種文化消費的建築生產——為經選擇過之大眾所提供的一種文化享受。他也批評羅伯·范求利與路易士·康，認為他們兩都將建築轉向其自身之內，不論他們的新的想像領域是來自表徵了全球性商業價值的圖象，或是來自不存在的（制度）的夢境（Tafuri, 1976: 53-58）。然而，塔夫利要如何回答丹妮斯·史考特·布朗（Dennis Scott Brown）在其標題為“建築形式主義與社會關懷：社會規劃師與激進時新的建築師之論述”（On Architecture Formalism and Social Concern: A Discourse for Social Planners and Radical Chic Architects）（Scott Brown, 1976）中所提出的質疑呢？對塔夫利言，為史考特·布朗所攻擊的社會規劃師與激進時新的建築師正是前衛主義者。他們的角色在塔夫利之《建築與烏托邦》中已被全面地揭露了。這些問題可能是甘尼斯·佛明頓（Kenneth Frampton）的弱點，而不是塔夫利的痛處。對塔夫利式的批判歷史的論述言，回應史考特·布朗之挑戰的真正弱點是塔夫利式論述中形式的特殊性課題。

波伊斯的問題主要是針對實體的空間形式本身。由於歷史的空間形式不是一種單純的靜態心象象徵，而是一種意識形態鬥爭的衝突模式。我們必須能處理在歷史脈絡、社會內容與空間形式之間社會的、政治的、專業的意識形態的中介（mediation）。

讓我們在美學論述中處理空間的形式。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知道在特殊脈絡中的空間形式，其物質性的特殊性，以及社會地位與歷史地建構的經驗方式。這也就是說，我們必須闡明在主體與客體兩者間的意識形態連結。

一方面，拒絕了索緒爾之“表現主義”的語言學，空間



元素提供了在特定論述中，衝突的社會團體鬥爭的地方。意識形態深深地連結在空間元素的模式之中。這就是說，既定的空間是特定之歷史地與意識形態地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

另一方面，空間形式是感覺的形式。設若拒絕了現象學的自由飄浮的地方感，空間形式則是一種觀察世界特殊方式，是在特定時期社會變動的衝突過程中，社會意識的結構。設若拒絕內容主義者單純地化約內容為意識形態，化約形式為裝載意識形態的容器的話，空間的意識形態其實是種意象化了的意識形態，而同時，它却不能直接傳譯為政治的意識形態（Hadjinicolaou, 1973/1978: 15-16）。所以，空間形式語言的特殊性對使用者產生效果，它關乎營造物在表意實踐（signifying practice）中的運轉展現，這就是美學中的營造修（措）辭（building rhetoric）之所做所為。

然而，並沒有什麼傳統美學中的“無利害關係性”（dis-interestedness），美學是社會地制度化了的論述與權力。審美的經驗是社會地與意識形態地安置好了的，以及同樣不可化約為社會的或意識形態的（Wolf, 1983: 84）。審美的敏感性是與階級和性有關連的，同時，對美學形式本身的辨識必須被視為正文中之愉悅的主要來源（Lovell, 1983: 95）。“建築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被中性化了、自然化了的修（措）辭。然而，在討論政治、社會、經濟之外，一個批判的史家也必須處理形式本身。即使如此，塔夫利的“客體的危機”也不應被責難太多，它論述地與塔夫利的宣告有關：建築師被悲觀地，命中注定在其論述之中。當然，在目前的脈絡中，建築師確實已不是社會與歷史轉化的中心，而是在其專業論述中的社會分工。塔夫利遺責建築的實踐，認為它已被建構為一種非論述的批判的工作（non-discursive critical work）。這種改良主義的神話確實應被摧毀。我們需要一種對專業角色與其功能的社會政治批判，即，我們需明白：空間形式的意識形態表現。在意義界定的戰場上，社會變遷的衝突過程是經由社會與歷史角色的表現限制了空間的象徵的條件——這正是設計師的角色，而都市功能的政治協商者——則是規劃師的角色了（Costells, 1983: 503）。

然而，假如營造形式的特殊性被忽略了，被化約為一般的意識形態而非衝突的意象意識形態，就在權力與論述間有了一問題。在特定的時刻，空間作為一社會產品，總有某些來自真實戰鬥的信息，它不應該被忽略，它們確在特定脈絡所造就形勢之下會成為變遷的隙縫（enclaves of changes）（Jameson, 1985），在系統中的早期缺口與隙縫往往是帶動其他部分改變的必要過程。星星之火可能成為燎原烈焰的熊熊之火。這是女性主義批評、文化批評等等得以致力之所在，也關乎我們要在下面進一步談的社會

歷史變遷過程中集體的主體的理論問題。

## （二）論述，空間形式與衝突的社會經濟變動

雖然，塔夫利的歷史方法並非一種秘術——其精煉了的理論架構是與眾不同的，然而在歷史脈絡、社會內容與空間形式間的關係的課題上它表現得仍有些曖昧。缺乏清晰性並不全然由於塔夫利歷史寫作的翻譯問題（註14）。部分的理由是由於福寇有意的語言所造成的問題。對福寇與塔夫利言，由權力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涉及對他們自己語言的一恒常質疑（Lemert and Gillan, 1982: 91）。這部分的理由或許關乎其歷史方法的認識論：

塔夫利在其歷史方法中拒絕了社會理論。對他言“理論”這個字意謂著知識的綜合整體，它意謂著將空間形式帶回到整體性上去。這個中心性自從十八世紀以來就失去了，這或許在十七世紀就已經存有危機了（Tafari, 1981c: 9）。他拒絕了在馬克斯·韋伯與艾文·潘諾夫斯基的工具抽象之後的隱藏的網絡，而寧取一種固定的抽象來給予一個理論方向，譬如說，馬克斯在政治經濟學分析上的抽象（Tafari, 1979/1980: 57, 64）。他也拒絕了像阿諾·豪塞（Arnold Hauser）的庸俗社會學，庸俗馬克斯主義的反映論模型，以及馬庫色學派等等。所有這些塔夫利式的方法論上的傾向都可以被了解與接受。然而，一個社會的，分析性的理論難道不可避免地與詮釋性知識的歷史方法相對立嗎？

事實上，塔夫利知道馬克斯的歷史方法是由歷史的前題出發——這前題是人，但是是處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上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只要這能動的生活過程被描述出來了，歷史就不再像是在經驗主義者那兒，是一僵化事實的集合，或者像是在觀念識者那兒，是一想像主體的想像的活動（imaged activity）。”知識將經由抽象而取代意識，它由於對人的歷史發展的觀察中獲得。這些抽象不能與觀察歷史的觀察脫離。他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各層次間的連貫性，但却非給予各歷史時代一通用的公式。（Marx, 1945-46/1970: 42）。批判歷史對建構結構性的循環再三致意。對結構性的循環言，“歷史不外是各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產力；由於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條件下繼續從事先輩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改變舊的條件（P. 57）。但是不是後一時期成為先一時期的歷史的目的（目的論）（使命）。換句話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Marx, 1951-52/1969: 398, 1842: 603）。總之，兩條認識論的主旨呈現於此：1. 客體性（對象性）（objectivity），在本體論向度的，

社會形成的相對獨立的現實性。2. 認識過程中的勞動，在認識論向度中的人類實踐（Bhasker, 1983: 254）。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知識是在經驗與觀念論間，社會科學與歷史哲學間、科學的與批判的性質間的張力之中建構起來的。

處理社會生活的物質性與人類主體的實踐，這兩主旨間的關係，塔夫利的歷史方法中對意識形態與權力的概念可以再度加以審視：

塔夫利經由其脈絡式的詮釋以及對關乎空間形式的意識形態機器之理論角度來評估前衛建築師們的寫作與實踐。然而，在他們自我表現的寫作論述、專業實踐的象徵空間、經濟與政治實踐等等之間的非直接關連，必需加以區別出來，以及在其影響的每一層次上勾連貫穿起來，在塔夫利的早期寫作中（Tafuri, 1968/1970/1976/1980f/1973/1976），塔夫利界定意識形態為錯誤意識的結構，為支配系統的知識份子所給予，建築為意識形態，所以為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所支配，它建構一不可避免會導向失敗的烏托邦幻覺。這個悲觀主義是由其對意識形態一般化的觀點所造成的，這個一般化的意識形態變成一個先驗地存在於其論述之外的東西。意識形態似乎變成結構主義的，半康德主義的前題，而非一衝突階級中的“諸意識形態”。在意識形態與科學間的差異，不能單純地區分為錯誤與真理間一般性的差別。在社會實踐中，有不可避免的意識形態的層次（註 15）。事實上，科學是一種勞動的社會分工，生產關係與社會分工的結果。意識形態的扭曲不能由批判來克服，而只有當支持意識形態的現實中的矛盾，在現實社會關係中的矛盾，實踐地被轉化了，意識形態的扭曲才能被清除。理論的鬥爭僅是整個認識論實踐的一個階段而已。這個意思是，意識形態顛倒的根源是現實本身的顛倒。意識形態的顛倒超過了哲學所謂的異化或是幻覺。它表現了現實世界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現實的矛盾，即，商品的拜物教及其秘密。

超過假設建築為一種封閉的、支配意識形態機器，同樣的傾向性也可以在塔夫利對權力與語言的精煉模型之中發現。對塔夫利而言，歷史是當戰爭過後，遺留在戰場上的線索上的建構。在這個意思上，歷史重建的這側面，也是彼此之間張力的對抗力量的戰場。歷史是戰場，而不只是發表宣告的地方。（Tafuri, 1981c: 9）

然而，在這個戰場之中，一般化了的權力低估了集體的主體之實踐，像，社會運動、階級與性別的鬥爭。專業的論述，像規劃與設計；並不是一種封閉的意識形態機器，而是一種意識形態與專業的戰場。它不僅關乎制度／機構——國家機器，與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現實的矛盾，而且反應了集體的主體的鬥爭的衝突。進一步，在歷史戰場中的對抗的力量肯定不只是發生在語言之

中，對塔夫利言，歷史再生產了戰鬥，但僅僅是重建語言本身的戰鬥。塔夫利接受了“解構”（deconstruction）的遺產。同時，它是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的重建。簡言之，權力與論述變成半康德主義式的非社會與非歷史的先驗。

此外，戰鬥中的對抗力量是歷史中的具象。歷史經由抽象再生產了在另一領域中的戰鬥。一個分析的架構將有助於掌握複雜的現實，因為本質、內在的聯繫與複雜的變化規律往往集中在概念之中。然後，抽象將在進一步具象中被再度表現為社會實踐。這是一實踐認識論的整個過程（具象——抽象——具象）。這意謂一種對歷史哲學與社會分析理論之間張力的理論調整。

空間形式與社會經濟利益關係間清楚的抽象會幫助我們超越了在社會與歷史變遷中單純的空間觀點。譬如說塔夫利曾經類比美國的中心商業區的摩天大樓為升起的公司資本主義的天主堂——空間形式，經由技術與其意識形態，表徵了資本。假如不嫌過分挑剔的話，在社會經濟利益與空間形式之間的傳遞過程需要更細緻的理論範疇來處理它們之間更複雜的關係，來有效回答空間的多重意義，摧毀在符號、語言與意識形態周緣的拜物教神祇。這不正是晚期塔夫利式歷史計劃所要求自己必須仔細處理的事嗎？語言形式表徵的複雜變化，形式表徵與功能內容之間的相對自主性需要清楚的理論抽象。空間的文化意涵並非僅靜態地關乎思想觀點、關乎心理表現，而是關乎衝突的歷史社會動力對空間意義所賦與的結構性展現過程。

有別於經濟利益決定空間形式的提法，曼威、柯司特所建構的歷史意義、社會功能與空間形式之間的關係與層級的理論角度可以做為參考。此處，所有的空間意義與功能都不是一種中性的經驗對象，而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這也就是說，空間（每一種類型的空間）是歷史的社會來決定空間的意義是什麼。空間的文化形式是空間意義的象徵表現，它總是為歷史主體之間的衝突過程所決定。順著這個邏輯，空間的社會變遷被稱為空間意義的再界定。所以，規劃被稱為為了分享空間意義的空間功能協商的調適。設計則被稱為象徵的（意識形態的）嚐試，在一特定的空間形式中表現一被已接受的空間意義（Castells, 1983: 302-304）。

事實上，這個分析架構可以總結為兩個研究的問題：空間如何被塑造與生產，以及有意圖的人類作用者在特定歷史脈絡中如何推動結構性的空間變遷之過程。塔夫利受惠於班哲明對藝術生產過程的分析，他們都教導我們，當空間在特定歷史脈絡之中像一種商品來生產時，傳統建築的獨特性的風味、永久性與整體性（事實上，建築是社會地與歷史地建造起來的某一類型的空間）為營造工業所清除，為房地產開發所清除，為生活空間的分配所清除了。



空間誠然為社會衝突和矛盾性的期望所塑造了空間，但是，抗爭的線索和展望未來的不同預期也必可在空間的形式與意義中被辨認出來，我們必可找到這些爭議和衝突的痕跡，這些爭論的主題正是解釋歷史的關鍵所在，不止於此，歷史的時勢不止是要求我們社會地與歷史地分析空間的，為推動結構性的空間變遷做出必須的貢獻嗎？

## 註釋

註1：像吉瑟普·沙莫那（Giuseppe Samona）、卡諾·安莫尼洛（Carlo Aymonino）、維多里奧·葛里高蒂（Vittorio Gregotti）、阿多·羅西（Aldo Rossi）等等都是傑出的建築師。

註2：APAO 所打著萊特式旗幟的現代建築很容易被認為是美國傾向的有機主義者。但是對柴菲而言，它在戰後的義大利的建築論述之中，扮演了一個“第三勢力”的角色。柴菲的主要出版物為 *Metron* 期刊。

註3：MSA（Movimento Studi per l'Architettura）1955年6月在米蘭組成。

註4：BBRP—在米蘭的一建築事務所，由奇安魯奇·班費（Gianluigi Banfi）、魯道維柯·貝吉爾喬費（Lodovico Belgiojoso）、恩里哥·柏雷蘇提（Enrico Peressutti）與恩內斯多·羅吉斯（Ernesto M. Rogers）所組成。在班費死後，則以 BPR 為名。（Gregotti, 1968, 6）

註5：魯多維哥·郭若尼（Ludovico Quaroni）馬里奧·瑞多費（Mario Ridolfi），以及戰後年青的一代如安莫尼洛是有名的 INA 計劃的建築師—羅馬的提柏提洛區（Tiburtino district）的卡薩街廓（Casa block）計劃，這是義大利戰後文化中建築界“新寫實主義”典範。

註6：葛里高蒂曾引用此文（Gregotti, 1968: 49）

註7：六〇年代末，在義大利脈絡裏所發展的設計方法與英美實証主義傳統完全不同。義大利經驗強調類型（typology）與歷史（對義大利人言，這意謂一社會、政治的理論）（Llorens, 1981: 93）

註8：塔夫利在 1968 年接受了 IUAV 的建築史講座。

註9：例如，安莫尼洛、羅西與卡迪拉等的類型批評（Tafuri, 1968/1970/1976/1980f: 158）。

註10：塔夫利本人是拒絕海德格的終極性提法，然而在達哥的作品中却可見到比較大的海德格影響。

註11：作者將在另處專門討論阿圖塞主義者的理論的得與失。

註12：以塔夫利的觀察，史家的工作不是去提供批評的體

系。經由批評來給予規範性的價值是中世紀的態度。這是建築設計課的評審制度的中世紀根源，然而塔夫利與盎格魯—薩克遜傳統的“思想家之對抗”不同，這也就是說，批評暗涵了一種神的裁判。塔夫利說：“我們沒有神，我們只有語言，許多種語言”（Tafuri, 1981c: 12）。

註13：由金斯堡與伯斯培利那思借用，對塔夫利言，歷史學的迷宮關乎歷史研究的神秘空間之錯綜複雜的網路之意象。歷史分析的迷宮之路似乎可以連上福寇的論述實踐的想法。它表明了歷史研究困難的道路、疑旨、哲學架構的複雜過程。或許，某個程度上，迷宮可以在建築史中有更多的涵意——這是對產品偉大信心的象徵。以極大的自信，哥德大教堂的師傅們在西向的神龕之地板中心簽署他們的作品。他們認為他們自己是偉大的傳說中之營造者——戴德拉斯（Ocedalus）——米羅迷宮的營造者之後裔（見 Hofstatter, 1970: 57）。

註14：賓吉里諾·阿西里諾（Pellegrino d'Acierno）在因塔夫利反對而未能隨《領域與迷宮》之英文版刊出的介紹性前言中一再強調塔夫利寫作的翻譯困難，這個困難可比喻為塔夫利式的義大利飛拉利（Ferrari）跑車轉換為英語世界的福特汽車一般（d'Acierno, 1987）。

註15：很意外，塔夫利在 1981 年的一訪問中仍宣稱：他沒有意識形態。（Tafuri, 1981: 11）。

## 參考文獻

AAM

1978 Rational Architecture Rationnell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ity, Bruxelles: AAM Editions.

Allpere, Jean

1984 “Manfredo Tafuri,” Arkitektur. Vol. 84, No. 5, June, pp. 21–25.

Anker, Andrew, and Mark Kessler, W. Scott Clark, ed.

1984 “Autonomous Architecture,” The Harvard Architecture Review, Vol. 3, Winter.

Argan, Giulio Carlo

1963 “On the Typology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Dec., pp. 564–565.

Aymonino, Carlo, et al.

1964 “Dibattito,” Casabella. No. 289, July, pp. 4–15.

Aymonino, Carlo

- 1985 "Type and Typolog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5, No. 5/6, pp. 49-51.
- Bandini, Micha  
1981 "Aldo Rossi," AA FILES. No. 1, Autumn, pp. 106-111.  
1984 "Typology as a Form of Convention," AA FILES. No. 6, May, pp. 73-82.
- Bois, Yve-Alain  
1977 "Rev. of M. Tafuri's Theories et historie de l'architecture," Oppositions, No. 11, Winter, pp. 118-123.
- Boyer, M. Christine  
1984 "Rev. of Gg. Ciucci et al.'s The American City," Design Book Review, Spring, pp. 111-112.
- Brown, Denise Scott  
1980 "Architectural Taste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The Harvard Architecture Review, Vol. 1, Spring, PP. 41-45.
- Cacciari, Massimo  
1980 "Eupalino or Architecture," Oppositions, No. 21, Summer, pp. 106-116.
- Castells, Manuel, ed.  
1985 a High Technology, Space,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 Castells, Manuel  
1984 Towards the Informational City?. Berkeley: IU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Colquhoun, Alan  
1981 Essays in Architectural Criticism: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Histor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Croset, Pierre-Alain  
1984 "Rev. of A. Foscari and M. Tafuri's 'armonia E I Conflitti,'" Design Book Review, No. 5, pp. 52-54.
- Curtis, William  
1981 "Rev. M. Tafuri and F. Dal Co's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K. Frampton's 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Vol. XL, No. 2, pp. 168-170.
- Dal Co, Francesco  
1978 "Criticism and Design: For Vittorio Savi and Aldo Ross," Oppositions, No. 13, Summer, pp. 1-21.
- David, Laing  
1978 The Marxist Theory of Art,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
- Dickens, Peter  
1979 "Marxism and Architectural Theory: a Critique of Recent Work,"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Vol. 6, pp. 105-116.  
1981 "The Hut and Machine: Towards a Social Theory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32, No. 1-2, pp. 18-24.
- Dunster, David  
1977 "Critique: Tafuri's Architectural and Utopia,"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3, pp. 204-212.
- Fishman, Robert  
1980 "Utopia and its Discontent,"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 Vol. XXXIX, No. 2, pp. 153-155.
- Gregotti, Vittorio  
1968 New Directions in Italian Architecture. London: Studio Vista.
- Gregotti, Vittorio  
1985 "Territory and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5, No. 5-6, pp. 28-34.
- Hancock, John  
1980 "Rev. of Giorgio Cirucci et al. ed., The American C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Vol. 46, No. 4, Oct., pp. 469-471.
- Hofstatter, Hans H.  
1970 Living Architecture: Gothic,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 Jameson, Fredric  
1984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6, pp. 53-92.  
1985 "Architecture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Joan Ockman ed., pp. 51-87.
- Krier, Leo  
1979 "The Cities within the City II Luxembourg,"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49, No. 1, pp. 19-32.



- Krier, Rob
- 1979 "Typological and Morphological Elements of the Concept of Urban Spac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49, No. 1, pp. 1-18.
- 1982 a Rob Krier: Urban Projects 1968-1982, New York: Rizzoli.
- 1982 b On Archite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Academic Editions/St. Martin's Press.
- 1983 "Elements of Architecture",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3, No. 9/10, pp. 1-88.
- Krier, Leon
- 1981 Drawings 1967-1980, Brussels: AAM Editions.
- Llorens, Thomas
- 1981 "Manfredo Tafuri: Neo-Avant-Garde and History,"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file, pp. 83-95.
- Maxwell, Robert
- 1977 "Tafuri/Culot/Krier: The Role of Ideolog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3, No. 77, pp. 187-212.
- McLeod, Mary
- 1984 "Rev.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by Aldo Rossi," Design Book Review, Winter, pp. 49-55.
- 1987 "On Criticism," Places, Vol. 4, No. 1, pp. 4-6.
- Mead, Christopher
- 1983 "Rev. of Survey and Comparison of Buildings of all Types, by Jean-Nicholas-Louis Durand," Design Book Review, Summer, pp. 12-15.
- Moneo, Rafael
- 1978 "On Typology," Oppositions, No. 13, Summer, pp. 23-45.
- Morachillo, Paolo
- 1985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5, No. 5/6, pp. 70-71.
- Porphrios, Demetri
- 1981 a "On the Methodolog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y,"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file.
- 1981 b "Note on a Method," Architectural Design Profile.
- 1982 Sources of Modern Eclecticism: Studies on Alver Aalto,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 1985 "On Critical History,"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Joan Ockman et al. ed., pp. 16-21.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Rossi, Aldo
- 1979 Aldo Rossi in America: 1979 to 1979.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
- 1981 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Trans. Lawrence Venuti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1966/1982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Trans. Diane Ghirardo and Joan Ockma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1983 Aldo Rossi: Selected Writings and Projects, London: Architectural Design.
- Samona, Giuseppe
- 1971/1985 "Architectural Tradi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5, No. 5/6, pp. 57-57.
- 1971/1985 "An Assessment of the Future of the City,"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5, No. 5/6, pp. 16-18.
- 1985 "Why Not?"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5, No. 5/6, pp. 4-14.
- Stewart, David
- 1975 "Rev. of Manfredo Tafuri: Teorie e Storia dell' Architettura" A + U, Vol. 12, No. 60, pp. 27.
- Tafuri, Manfredo
- 1963 "Architectural e socialismo nel pensiero di William Morris," No. 208, Oct., pp. 36-41.
- 1964 Ludovico Quaroni e lo sviluppo dell' architettura modern in Italia. Milan: Comunita.
- 1965 a L'architettura mooderna in Giappone. Bologna, Cappelli.
- 1965 b "Borromini el, esperienza della storia," Comunita.
- 1966 a L'Architettura sel Manierismo. Roma: Officina.
- 1966 b "La poetica borrominiana: mito, simbolo e ragione," Palatino, Vol. 3, No. 4.
- 1969 a L'architettura dell' Umanesimo. Bari: Laterza.

- 1969 b Jacopo Sansovino el, architettura del, 500a Venezia, Padova: Marsilio.
- 1969 c "Rer una critica dell'ideologia architettonica," Contropiano, No. 1.
- 1970 "Two Tools of Theory," Architectural Review, Vol. CXL VII, No. 877, p. 4.
- 1972 a "Il metodo di progettazione nel Borromini," Vol. II, Roma. Studi sul Borromini. Accademia di San Luca ed.
- 1972 b "Design and Technical Utopia," Italy: The New Domestic Landscape: Achievements and Problems of Italian Design. Emilio Ambasz, ed., pp. 388-404,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 1974 a "L'Architecture dans le Boudoir: 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Criticism of Landscape," Oppositions, No. 3, pp. 37-62.
- 1974 b "German Architecture: 1928-1933," WERK. Vol. 61, No. 3, March, pp. 308-319.
- 1975 "Toward the Socialist City: Research and Realiz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between the NEP and the First Five Years Plan," Lotus, No. 9, Feb., pp. 76-93.
- 1976 a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Design an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Original Italian Edition 1973)
- 1976 b "Les cendres de Jefferson (The Ashes of Jefferson)," L'Architecture d'Aujourd'hui. No. 186, Aug/Sept.
- 1976 c "European Graffiti: Five x Five = Twenty-five," Oppositions, No. 5, pp. 35-74.
- 1976 d "Order and Disorder-The Dialectic of Modern Architecture," A+U, Vol. 10, No. 70, pp. 97-120.
- 1976 e "This is not a pipe," Lotus, No. 13, No. 5, Dec., pp. 10-13.
- 1977 a "Giuseppe Terragni: Subject and Mask," Oppositions, No. 11, pp. 1-25.
- 1977 b "The Dialectics of the Avant-Garde: Piranesi and Eisenstein," Oppositions, No. 11, pp. 72-81.
- 1977 c "Architettura e linguaggio," Casabella, Vol. 41, No. 429, Oct., pp. 9-30, 63.
- 1977 d "Arquitectura e historiografia: una propuesta de metodo," Arquitectura, No. 204-205.
- 1978 a "Das Konzepter typologischen Kritik," Arch +37, pp. 48-49, 63.
- 1978 b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Skyscraper," Wonen-TA/BK, No. 11, June, pp. 25-34.
- 1979 b "Main Lines of the Great Theoretical Debate ove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1960-1977," A+U, Vol. 1, No. 100, Jan., pp. 133-154.
- 1979 c "The Historical Project," Oppositions, No. 17, Summer, pp. 55-75.
- 1979 c "Discordant Harmony from Alberti to Zucchi," Architectural Design, No. 5/6, pp. 36-44.
- 1979 d "Borromini und Piranesi: Die Stadt als zersprengte Ordnung," Weerk/Architese, No. 33-34, Sept/Oct., pp. 6-12.
- Tafuri, Manfredo, and Francesco Dal Co  
1979 Mod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Henry N. Abrams. (Trans. Robert Erivch Wolf)
- Tafuri, Manfredo, et al.  
1980 The American City: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 1980 a "The Watercolors of Massimo Scolari," Massimo Scolari: Architecture Between Memory and Hoper. New York: IAUS.
- 1980 b "Nature/Artificial: The Architecture of Franco Purini," A+U, No. 119, pp. 35-40.
- 1980 c "Aldo Rossi a Venezia," Domus, No. 602, Jun., pp. 7-11, vi.
- 1980 d "La Cattedrale Sommersa," Domus, No. 608, July/Aug., pp. 8-15.
- 1980 e "Das rote Wien' Politica e forma della residenza nella Vienna socialista 1919-1933," in Vienna Rossa, Milan: Electa, pp. 7-148.
- 1980 f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New York: Harper. (Original Italian edition 1968/1970/1976)
- 1981 a "Am Steinhof: Centrality and 'Surface' in Otto Wanger's architecture," Lotus International, No. 29, 72-91.
- 1981 b "The Uncertainties of Formalism: Viktor Skiovskij and the Denuding of Art," Architectural Design 6/7, pp. 73-77.
- 1981 c "Interview," Transition. Sept/Dec., pp. 7-12.



- 1981 d "IACP Housing at Corviale," Domus, No. 617, May, pp. 22-26.
- 1981 e "The Andlyst of Fragments," MODO, Vol. 5, No. 41, July-Aug., pp. 14-17.
- 1982 a "Classical Melancholies," Architectural Design, Vol. 52, No. 5-6, pp. 7-17.
- 1982 b "vorm en verzaadiging: Tang's werken in de jaren 50," Thema, plan 2, pp. 24-33.
- 1982 c "Architecture and Poverty," Architectural Design, July-Aug., pp. 57-58.
- 1982 d "The 'new Constaipol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novatio' in Venice during the Humanism(1450-1509)," Ressegna, No. 3, pp. 25-38.
- 1984 a "Interview," Domus, No. 653, Sept., pp. 26-28.
- 1984 b "Machine et memorire' La citta nell' opera di Le Corbusier," Casabella, Vol. 48, No. 502, May, pp. 44-51.
- 1984 c "A Theatre a 'Fountain of the Sil' and a Pretty Little Hill: Alvise Cornaro's Redesign of San Marco Basin Venice," Lotus, No. 42, pp. 41-51.
- 1984 d "Carlo Scarpa and Italian Architecture," Carlo Scarpa: The Complete Works. F. Dal Can and G. Mazzariol, ed., pp. 7-30, New York: Rizzoli.
- 1985 "U. S. S. R. — Berlin 1922: From Populism to Constructivist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Criticism Ideology, Princeton. Joan Ockman et al. ed., pp. 121-181. N. J.: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 1986 a "There is No Criticism Only History," Design Book Review, No. 9, Spring, pp. 8-11.
- 1986 b "Humanism,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Rhetoric: the Debate in Renaissance Venice," Walter Gropius Lecture April 130,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Design.
- 1987 a "Machine et memeire: The City in the Work of Le Corbusier," Le Corbusier, Princeton. Allen Brooks ed.,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7 b 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 Avant-Gardes and Architecture from Piranesi to the 1970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 Press. (Original Italian edition 1980)
- Vidler, Anthony
- 1976 Oppositions, No. 7, Winter, pp. 1-4.
- 1977 a "Special Issue Paris under the Academic: City and Ideology," Oppositions, No. 8, Spring.
- 1977 b "Commentary," Oppositions, No. 9, Summer, pp. 3-5.
- Viladas, Pilar
- 1981 "Harmony and Wholeness," 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Vol. 6, No. 86, June, p. 92.
- Wojtowicz, Jerzy
- 1984 Illegal Facades. Hong Kong: Jerzy Wojtowicz.
- Yates, Dame Frances
- 1981 "Architectural Themes," AA FILES, No. 1, Autumn, pp. 29-53.

## 後記

作者感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史教授瑪麗·麥克里歐 (Mary Mcleod) 女士之指正及資料提供。